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

吴泽题

● 桂遵义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是国家教委“七五”科研规划项目之一。

本书所涉时限，上自1919年“五四”运动，下迄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结合中国现代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分四编撰写。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以其史学活动和论著问世的先后为顺序，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予以评价。

本书编写的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进行系统地论述，并侧重于介绍和总结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继承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成果，发扬其优良的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

本人60年代初，在吴泽师的指导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当时，高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委托吴泽教授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我有幸跟随吴泽师拜访了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尹达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就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的有关原则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等问题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聆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诲，萌发了我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意愿，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搜集和编写有关专题资料长编，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心愿难以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和肃清“左”的影响，在国家教委科研基金的资助

下，使我有条件集中精力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因此，本书的编写，是党的三中全会雨露阳光滋润的结果，寄托着我对已故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缅怀之情！

本书编写过程中，吴泽师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殷切关怀和热情指导，并亲自为之题签。周朝民为本书编写了第四编初稿；朱政惠、王东、周一平等为本书提供了部分专题研究。在此，我深表谢忱！

值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竭诚地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本人由于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有限，离预想的目的有一定的差距，不足之处，请海内外学者们指正。

桂 遵 义

一九九二年春于上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1919—1927)	(1)
概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	(3)
第二节 李大钊、李达等对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1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斗争中初步成长	(29)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任务	(2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初步成就	(37)
第三节 工农运动史研究的兴起及其成就	(57)
第四节 蔡和森、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和恽代英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69)
第二编 (1927—1937)	(93)
概论	(93)
第三章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97)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缘起和“动力派”等对中国社	

	会性质的歪曲·····	(6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	(118)
第三节	“新思潮派”对若干史学理论的探索·····	(131)
第四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14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143)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161)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成长·····	(190)
第一节	郭沫若对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190)
第二节	吕振羽对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211)
第三节	翦伯赞、邓拓、吴泽对中国古代史的开拓和贡献·····	(234)
第四节	邓中夏的工人运动史、华岗的大革命史和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成就·····	(243)
第三编	(1937—1949) ·····	(275)
概论	·····	(275)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史学理论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	(281)
第一节	对唯心主义史学理论的批判·····	(28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	(291)
第七章	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成就·····	(319)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及其新成就·····	(319)
第二节	中国通史研究及其成就·····	(358)
第八章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及其成就·····	(385)
第一节	郭沫若与先秦思想史研究·····	(385)

第二节	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398)
第九章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和通俗历史著作的编写	(413)
第一节	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及其成就	(413)
第二节	新编历史剧和通俗历史著作的编写	(433)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任务和 在斗争中发展	(443)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战斗任务和 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	(443)
第二节	范文澜、胡绳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成就	(451)
第三节	吕振羽的民族史研究和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 史	(456)
第四编	(1949—1956)	(476)
概论		(476)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史学基本 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479)
第一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一步清算资产阶级唯心 论	(479)
第二节	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和成就	(492)
第十二章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世界史研究 的初步成就	(534)
第一节	民族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民族史理论的探讨	(534)
第二节	世界史研究的开展和初步成就	(544)
第十三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体系的建 立	(560)
第一节	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的研究	(560)
第二节	中国现代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的建立	(572)
第三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普遍开展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	

的三十年).....	(580)
第十四章 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	(586)
第一节 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成就.....	(586)
第二节 甲骨学与商代史研究的新成就.....	(597)
第三节 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	(605)
后 记.....	(609)

第一编(1919—1927)

概 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根据历史事实研究和阐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梁启超等曾竭力倡导建立“新史学”，但这种“新”，是相对封建旧史学而言的，严格说来，还不成为真正的科学。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以观察中国社会和研究历史，实现了中国史学的伟大变革，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国情，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了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时党内外歪曲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种种言论，着重开展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研究。其间，发表了周恩来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瞿秋白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方式》、肖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况》等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有力地宣传

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了总结工农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指导正在深入开展的工农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又开展了工农运动史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的研究，并出版了刘少奇、朱少连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和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论著，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农运动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先河。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有着深远的意义。蔡和森、瞿秋白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问世，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上也开始探索，并取得初步成就，出版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论著。这些著作，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初创到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及其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历史学经历过漫长的发展道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马克思主义未传播到中国来以前，历史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直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并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历史学才逐步走向真正科学的道路。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怎样传播的呢？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之后，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为寻求救国的真理，在学习欧美学说同时，并涉猎当时盛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896年，孙中山蒙难脱险在英国伦敦居住时，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书刊，这时他作为第一个中国人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要中国留学生研究这些著作，从中吸取营养。后来，在我国国内出版的一些学者的著作中陆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著作和学说。1899年3至4月间，上海新学会根据《万国公报》月刊上所载的英国资

产阶级社会学家颌德著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注为中文），出版线装本。该书多处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如称：“德国的马客恩（即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著于资本者也”。^①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编辑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题为《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称赞“麦喀士（即马克思）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②190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8期发表署名大我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文中简要介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并称：今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将遵循着万国劳动同盟宣言，达到‘无人种之别，无宗教之别，无国界之别’的社会”。文中提到关于共产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原理说，“土地与资本，生产之资也。若地主，若资本主，何需乎？土地、资本、离地主、资本主而依然存在也。若财产基本先占，必至后起者无立锥之地”，“故必废私有相继制而归于国有。”^③1903年2月《译书汇编》（第2本第11期）载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其中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之人也。马克思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还附有《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同盟会机关报）发表署名蜚仲、悬解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和《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中，介绍了拉萨尔的生平和学说，并和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比较，说“拉萨尔之言社会革命不为马尔克（即马克思）言之完也。”^④毛泽东曾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拓荒者”。^⑤1907年7月，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中国“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第

^{①②③④}转引自梁学健、何士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践》1982年5期。

^⑤转引自王国荣，《辛亥革命的海燕—朱执信》，《书林》1981年第6期。

15期，刊登了恩格斯于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的译文，并加了按语。1908年，《天义报》又刊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部分译文。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刊登蜚仲译述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介绍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概略。上述情况表明，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的刊物及其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粗浅的、片断的介绍，尽管他们有些论著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知识或新学派来介绍，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更谈不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中国人民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人民之所以“痛不堪痛”，“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要拯救劳动阶级，改造旧中国，只有去“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要走这条路，就要加紧探寻马克思主义。”要探寻、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并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用马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6页。

克思主义去武装人民群众。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杨匏安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1913——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并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所以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我国，他深受鼓舞，就毫不踌躇地转向马克思主义一边，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1月，他进北京大学不久，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十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文章。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改组了北京《晨报》副刊，亲自参加编辑工作，1919年5月，该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刊登马克思原著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在译著方面，1919年底，蔡和森在留法期间，以惊人的毅力，日以继夜地“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主义小册子。李达除在《民国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之情形》等文外，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三部著作。同时，陈望道译了《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了《阶级斗争》，李汉俊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这些译著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同时期，许多社团和报刊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面各地涌现出来。在北京，除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和《周刊》外，有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出版的《国民》杂志，有赵世炎等组织的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半月刊；有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出版的《新潮》杂志；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组织的工学会出版的《工学》月刊。还有平民教育社出版的《平民教育》、觉悟社出版的《觉社新刊》、曙光杂志社出版的

《曙光》月刊，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在天津，有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出版的《觉悟》月刊。在上海，1919年6月，《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创刊；1920年11月7日，陈独秀、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1919年4月，新人社组织出版《新人》月刊。在湖南，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以后又组织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社团。在武汉，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肖楚女等组织互助社、利群书社，出版《新声》、《向上》、《教育旬刊》、《教育改造》、《新学生》和《互助》等刊物。在江西，方志敏、袁玉冰等组织的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和《青年声》等刊物。在浙江，有新潮社组织出版的《浙江新潮》和永嘉新学会组织出版的《新学刊》。在山东，有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的励新学会出版的《励新》月刊等。在广东，阮啸仙组织的新学生社，出版了《广东中华日报》等。在福建，邓子恢、陈明等以“改造社会、改造个人”为宗旨，在龙岩组织奇山书社等。^①据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前后，全国各地新出版的进步刊物达400种之多。这些刊物着重宣传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根源，同时，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政党的必要性。由于这些宣传活动，使全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二、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我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

^①参阅《五四时期的社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首先来自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7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诬蔑“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主义”，认为“空谈外国进口‘主义’，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①以此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针对这一股逆流，李大钊在同年8月17日《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化。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的一切”。至于来自胡适的恶意攻击，说什么“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器”的谩骂，那只好“任他们在旁边乱叫”，我们“那有闲工夫去理他！”^②给胡适等煽起的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力回去。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还有毛泽东、恽代英、方志敏、袁玉冰等坚决站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一边，对胡适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批判。他们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必须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恽代英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就“应否确定某种主义”，“应否参加政治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同时期，方志敏、袁玉冰等在《新江西》月刊上组织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造旧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因此，要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并以马克思为榜样，学会“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③通过辩论，驳斥了胡

^①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1期。

^②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见《李大钊选集》第228页。

^③袁玉冰，《敬告青年》，《新江西》第1卷第3号。

适及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战。1920年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先后在《新青年》、《改造》杂志上发表《现在与将来》和《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说“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①并说中国是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工人与商人都成为有力的阶级”，^②在这样的国家中，不仅没有谈论社会主义的“资格”，而且更没有实现的“余地”。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世界的资本阶级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则顺着此轨而进”，^③除此别无出路。针对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在《新青年》和《共产党》等杂上发表了許多文章，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底命运”^④，我们不能再走这条“错误的路”^⑤，“若是不幸真采取了资本主义，我国实业愈发展，则人民愈论于不幸的境遇中”^⑥，“只有采取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避去欧美资本主义制产业社会之一切恶果”^⑦，并“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成巩固的团体”^⑧，走社会主义路，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次论战进行了一年多时间，虽然由于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还缺乏深刻研究，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但对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是十分明确的。

第三，是“实行无政府主义，还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论战。

①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②③张东荪：《现实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④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⑤陈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⑥何孟雄：《曙光》，第2卷第2号。

⑦⑧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发表过一些改造旧社会的意见，但并没有给中国指出真正的出路。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强权”，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都要“排斥之扫除之”，我国“未来的国家，不管他是什么形式”，“一切都在反对之列”，中国要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他们鼓吹“绝对自由”，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到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内有两派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可以退出。赞同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去执行”。^①针对上述无政府言论，陈独秀、李达等在《新青年》和《共产党》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批驳。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权’，自然是对的”，但在阶级还没有消灭之前，不加分析地“闭起眼睛来乱反对强权”，那就错了。因为，“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没有这样“强权”的暴力革命，就不能推翻统治阶级。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宣布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由不胜感谢之至”，所以“无政府的党，真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②。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强权”的论调，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的复信中也作了明确回答。毛泽东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政府主义所谓“强权”的根本区别，也是对无政

①《区声白致陈独秀书》，《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②《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

③《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友》，《新民学会通讯》第3集。